

西洞庭湖区及沅、澧河道的历史变迁与汉寿县、常德县血吸虫病流行

车群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上海 200433)

【摘要】: 清中叶以降, 由于荆江水位抬高, 荆江分流入洞庭日益增强, 尤其自藕池、松滋溃后, 荆江四口南流入洞庭的形势形成, 大量泥沙倾注, 洞庭湖从此进入剧烈变动的历史时期。在湖区西部, 今汉寿、常德所处洞庭湖区, 由于北部淤沙成陆、新垸林立, 湖水逼而向西扩展, 明清修筑的堤垸大半沦没入湖, 形成大面积的由废垸组成的湖泊, 这些湖泊平浅、且底质肥沃, 夏水冬陆, 从而形成洞庭湖区最大面积、同时也是最严重的血吸虫病疫源地。笔者在前人有关荆江、洞庭湖变迁史研究的基础之上, 结合血防口述史料, 探讨大尺度的环境变动所引发的小尺度河湖变动, 及其所引发的血吸虫病流行。

【关键词】: 血吸虫病; 西洞庭湖; 环境变迁

【作者简介】: 车群 (1986—), 女, 山东烟台人, 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助理研究员, 主要从事环境史、疾病史方向研究。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长江中游及两湖平原历史冲淤变化与血吸虫病流行研究”(项目编号: 41701155) 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 K24 文 **【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4403 (2018) 05-0181-10 **【收稿日期】:** 2017-11-15

DOI:10.19563/j.cnki.sdzs.2018.05.023

血吸虫病为我国传统四大寄生虫病之一, 同时也是为害最剧烈的一种。据不完全统计, 在 20 世纪 80 年代, 血防工作进行了 30 年之后, 全国共查出血吸虫病人 1160 万, 受感染威胁人口在 1 亿以上。^[1]而洞庭湖区自 20 世纪 50 年代血防调查开始之初, 便被确立为整个长江流域最严重的血吸虫病疫区, 具体表现为疫区面积最大、受威胁人口最多, 同时, 自然疫源性最为显著。

根据 20 世纪 50 年代的血防调查, 常德市、汉寿县辖区, 即今西洞庭湖区域, 疫区血吸虫病平均感染率 25.5%^[2], 为洞庭湖区流行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汉寿县的地理环境为北部湖河纵横, 湖洲广阔, 中部靠山湖汉林立, 河湾蜿蜒, 水流缓慢, 土质肥沃, 杂草丛生, 冬陆夏水, 自然环境极其适宜其中间宿主钉螺的繁衍。尤其北部沅水洪道及洞庭湖左岸围堤湖、目平湖、洋淘湖、南湖、天心湖、沙湖、龙池湖等湖泊及其分支的湖汉、河湾, 存在大片的湖洲、浅湖, 均为淤泥底质, 土质肥沃, 湖草丛生, 钉螺密布, 为本区乃至整个洞庭湖区血吸虫病流行最主要的疫源地之一。然而, 这种自然生态环境的形成却是长时段的河湖关系发展、演化与变迁的结果。关于洞庭湖与荆江的历史变迁, 学界已有相当丰富的阐述。虽然在一些问题上有分歧, 例如, 先秦两汉时洞庭湖区究竟是平原水网, 抑或已形成湖泊; 唐宋以来洞庭湖形势究竟一直扩张, 抑或间有收缩等, 大概情形已基本厘清。既有的研究, 集中于探讨洞庭湖湖盆的演变、江湖关系的变化、淤积、围垸与湖泊形态的演变, 以及洞庭湖水面积的历史盈缩等论题^[3-11], 对大尺度环境变动影响下的区域河道与湖面变迁着笔甚少。笔者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之上, 仅就沅

水与西洞庭湖之河道与自然环境变迁做一简单梳理，并结合血吸虫病调查资料与口述史料，探讨该环境变化与血吸虫流行之关系。

一、沅水及其支流的历史变迁

在《汉志》与《水经》的年代，沅水“出牂牁”^{[2]卷二八}“又东至长沙下隰县西北，入于江”^{[13]卷三七}。“（资水）又东与沅水合于湖中，东北入于江也。”^{[13]卷三八}在先秦汉晋时期，今天的洞庭湖区仍为河网交错的平原地貌景观，有一些局部性的小湖泊，但尚未形成大面积的连续水面。时沅水过龙阳，会澧水分支，合资水、与湘水会同入江，下游河道交错漫流，一派湖沼水网景观。南朝时，伴随着洞庭湖水面的急速发展，沅水下游河道为湖水浸没，演变为“下注洞庭湖，方会于江”^{[13]卷三七}。而与此同时，《湘水注》有云：“湘水左则沅水注之，谓之横房口，东对微湖，世或谓之麋湖也。”微湖，大概为今岳阳县城以北，麻塘镇以南两山所夹之所，即横房口所在。单从史料文本来看，沅水的下游流经应分为两支，一支入湖，一支入湘。然而，南朝时，丰水期的洞庭湖南界可达今磊石山迤北一线，而横房口在此线以北，汛期入湘之口，必然浸入入湖，水涨入湖，水落入湘，文辞上也可解通。究竟为何种情形，已难以考证，若就地望而言，则后者更为合理。此时，沅、澧间河道仍在，沅、资是否相通，并无确证，张修桂以“沅水又东合寿溪，内通大溪口有木连理，根各一岸，而凌空交合，其水上承诸湖，下注沅水”一句，认为大溪口即沅水东通资水之交口^{[5]146}，本文沿用此说。

唐宋元有关洞庭湖水系的记载稀少又简略，大多沿袭汉志、水经注之言，唯有《岳阳风土记》载“沅水注于洞庭，谓之鼎江口”^[14]，唐宋时，根据前人研究，洞庭湖水面进一步向西扩展至赤山以西，沅水下游向东南入湘之故道均沦没入湖。据隆庆《岳州府志》，鼎江口位于“县东北四十里”^{[15]卷七}即当时沅江入洞庭湖之湖口。“黄洋，（华容）县西三十五里，沅水会赤沙，注洞庭之水，风土记云，澧水注于洞庭，谓之澧口，沅水注于洞庭，谓之鼎江口。又自鼎江口至游桥，入黄洋港，屈折而达褚塘诸湖池”^{[15]卷七}，入湖口情形并未发生改变。游桥，位于“（华容）县西六十五里渡通安乡”^{[15]卷七}。可见明中叶时，由于澧水、沅水的尾间的泥沙淤积，鼎江口附近淤洲扩大，已经淤出经游桥径华容黄洋港向北的分流河道。到清初，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中有关沅水入湖口的记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沅水）又东径常德府城南，龙阳县北，至沅江县之西南，而注于洞庭湖，其地名红沾口”^{[16]卷十五}。《行水金鉴》中也有类似的描述，“又东径常德府城南、龙阳县北，至沅江县之西，注于洞庭湖”^{[17]卷八〇}，可见清初，沅江入湖之口由明中叶汉寿县东北之鼎江口迁移至沅江县之西南，按其方位，当为其绕赤山以南入资水之分支故道，自明中叶以降至清初，由于澧水、沅水的泥沙堆积，原本东北入湖之通道渐渐淤塞不畅，其入资分流逐渐演变为入湖主泓。而与此同时，伴随着洞庭湖水面向南及向西扩展，入资尾间部分汛期为洞庭湖所浸没，只余赤山以东的一小截水道，与资水会于沅江小河口。沅水流域河道之地名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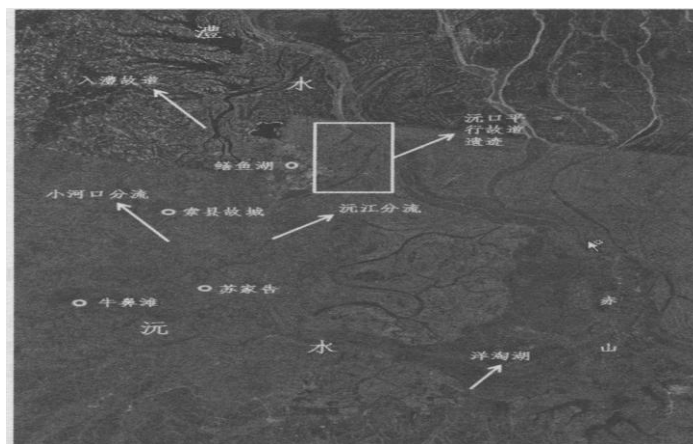


图 1 沅水流域河道及地名示意

到光绪年间，《龙阳县志》对当时沅水河道有详尽记载：

沅水经府城折东南流又东分二派，江中为人汨洲，故分二派，一东北流，又分二支，一支为沅水经流，一支为小河口分流；一南流至沧港塘北，折东北流，会前二支津，即汨洲与对岸小河口相合处，经龙阳县城北，又东会前一支津，入洞庭湖。^{[18]卷二}

汨洲，即今汉寿牛鼻滩以西之洲滩，时沅水至此分为两支，南支即原入资分支故道，后演变为沅水主泓。北支又支分为二，一为小河口分流，二为沅水经流。《水经注》云“澧水又东南注于沅水，曰澧口”^[13] ^{卷三七}《岳阳风土记》云“澧水注于洞庭谓之澧口，沅水注于洞庭谓之鼎江口”，可见沅澧自古相通，然而这条沅澧相通故道究竟位于何处？

嘉庆《常德府志》云：

相传元末开洪门口，以消沅水之泛涨，国朝乾隆五十四年，武陵知县许顺复开十丈，渐水遂由洪门口出泥港，会牛鼻滩小河之水，径侯家港，至茄子窖，又北会澧州、安乡县匡口之水出沙夹入沅矣。然府东牛鼻滩小河口，实为沅水之分流，北达于澧，通荆江之虎渡口；安乡西南之匡口，为澧水之分流，南通于沅，为常澧水道之快捷方式，渴则不可通，中则渐澧二水注之，而又会出沙夹以入于沅也。^{[19]卷五}

应先烈以出“安乡西南之匡口”，“南通于沅”之支流为《水经注》载澧水之分流入沅之通路。而实际上，按其地望，此应为宋时沅江主泓所经，经鼎江口入洞庭之一支，即光绪《岳阳县志》所载之沅水北支又东支的“沅水经流”。何以原本东北入洞庭湖之沅水河道到嘉庆年间演变为西南入沅？这与澧水河道变迁以及荆江分流三角洲的发展有关。

自唐宋以降，由于澧水及其北支澧水携带泥沙的不断充填，到隆庆年间，澧水主泓已然大大西移，到明中叶，由于澧水三角洲的发展，鼎江口附近淤洲扩大，已经淤出经游桥径华容黄洋港向北的分流河道，加之清初，虎渡河水势增强，愈加顶托澧水河道，康熙《龙阳县志》流花口一条载“由小河口分流，通华容交港，以达荆江，可避洞庭之险”^{[19]卷五}，到嘉庆年间，该分流已改通“安乡匡口”，可见淤塞之甚。据《直隶澧州志》载，“澧旧无堤垸，有之自前明万历年始”^{[20]卷四}，澧水流域在清初仍为“土旷人稀”，到乾隆十五年（1750），已是“深山穷谷，炊烟鳞比”，可见其淤积与开发情况。至同治、光绪，藕池、松滋溃后，澧水河道为荆江分流所夺，主泓被迫至安乡县境一隅，尾闾部分堤垸如鳞，迅速成垸，沅水入湖之鼎江口因而淤塞，为澧水河道所侵占，沅水河口也不断下移，在今天的卫星图片上，可见其河口处三段平行之旧道。此外，由于泥沙淤积，底垫日高，因河口高程的变化，以致旱季断流、汛期倒流，由“入湖”演变为“入沅”，甚至向南冲破丁家口，沿苏家告向南复入沅水，即光绪《龙阳县志》所谓“经龙阳县城北，又东会前一支津”也。

而光绪《龙阳县志》提及的小河口分支（即今谈家河所经），通行说法以该分支为明正統年间大围堤修筑后形成，实则不然，这条河道久已有之，即为宋以前澧水入沅之旧道。在历史上，此条河道几经塞而复通。崆龙城，又名索县故城，即今天常德县冲天湖南岸断港头，西汉时曾为索县（即汉寿县）县治，后又为武陵郡治，东汉时为荆州刺史治所所在，“而郡徙治临沅”^{[21]卷二七}，当时此地位于渐水沿岸，上通澧，下通沅，水运交通极为便利。后由于渐水逐渐淤塞，而丧失通衢之利，至魏，“州徙治江陵唐刘禹锡在《汉寿城春望》一诗中写道：“汉寿城边野草春，荒祠古墓对荆榛。田中牧竖烧刍狗，陌上行人看石麟。华表半空经霹雳，碑文才见满埃尘。不知何日东瀛变，此地还要成路津”，写的便是此地。到元末时，沅水仍可上达洪门口会渐水，后复淤，到乾隆年间武陵知县顿复于五村障内重开洪门口，渐水由此南汇于小河口，沟通沅澧。而关于“通荆江之虎渡口”，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提到：“按荆寇入湖有三道，或由荆江顺流直指城陵矶，或由调弦口入夏水经华容，或由虎渡达会口下安乡，邈景港黄洋入赤沙。”可见黄洋港在清初上通虎渡河，下接赤沙湖，因而有此一说。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清初《行水金鉴》中载沅水“至沅江县之西，注于洞庭湖”，然而在光绪《龙阳县志》中，沅水则“经龙阳县北，入洞庭”，从光绪《湖南輿图》中也可看出，在赤山以东，尚存有沅江口之地名，而赤山以西的沅江故道已然沦没入湖。这与荆江分流南下，北洞庭湖淤塞，洞庭湖水逼而向南、向西扩展有关。然而，光绪《大清会典图》中仍载：“（资水）经

沅江县治东，又北至小河口，支津西出注沅水。”^{[22]卷二一⁰}此应为旱季干出之河道。

综上所述，到光绪年间，沅水东北入鼎江口一支已完全淤废，原本的沅水主泓道演变为汛期澧水分流之季节性径流。到1947年，沅水自常德经流碧潭北流，经流花口崇河入鱗鱼湖，但如澧水猛涨，鱗鱼湖之水也可倒灌入沅^{[23] 5-12}，便为此条河道之遗迹。沅水主泓道自此完全转向经原本经大围堤、大连障以南向西经赤山以东小河咀入洞庭一支，然而，在不多西扩南展之湖面作用下，赤山以西至洋淘湖以西之沅水故道沦没入湖，沅水尾闾河道大大缩短了。

二、与水系变迁有关的堤垸兴筑与溃废

汉寿县堤垸修筑情况与沅水水系变迁进程相一致。明正統十一年（1446），伴随着沅水、澧水三角洲的不断扩大，以及北岸分流的渐渐淤塞，在沅水主泓北侧，挽修大围堤，“周环三万五千八百余丈，绵亘一百二十里，上接辰、沅诸水，下滨洞庭”^{[19]卷十一}当时的大围堤，包含今东起马家铺、西到小凡洲、南抵汉寿城、北至谈家河的大片区域。^{[24] 29}到嘉靖、万历年间，伴随着澧水主泓西移及沅水主泓的东迁，以及沅水东北分流的淤塞，在常德、汉寿县内，兴起了筑堤围垸的高潮，仅嘉靖十三年（1534）一年，据《常德地区水利志》考，汉寿县修堤、障32处，常德县10处^{[24] 172-175}，大多位于县北沅水东北分流沿岸及县东沅水主泓两岸。入清以后，康熙年政府鼓励开垦，加之社会安定、生计日繁，“南垦民日众，先后兴筑围堤，升科报粮”，数十年间，“堤垸如鳞，弥望无际”。从康熙三十三年到乾隆十九年的60年间，汉寿修筑堤垸无算，有名可考的64垸^{[25] 119}，大多位于县境东北与东南，然而其堤垸修筑的原因有所不同。在县境东北，照旧是由于澧水三角洲的扩展与沅水分支的淤积，康熙五十一年（1712）挽修太和障区域，雍正四年（1726）挽五福垸，乾隆八年（1743），酉港以南挽修大护国障，文未障，其趋势为逐步向东向北，往洞庭湖方向扩展，最北达酉港，最东可达紧靠赤山西缘。清初水波浩瀚的太白湖、西脑湖均在此时被围入垸内。而在县境东南，其堤垸修筑更多为了抵御不断西扩南展之洞庭湖水，雍正元年（1723），挽修青布垸地方，雍正三年（1725），向西南扩展到长汉垸地区，乾隆三年（1738），挽修茅汉障、大连障区域，乾隆十八年（1753），挽修红菱垸地方，其总体趋势与县境东北部区域相反，是由洞庭湖方向向西南部分发展，这与水面的不断向西南扩展有关。

汉寿向称水乡泽国，然而清中叶以前，水患虽时有发生，然而并不十分频繁。在藕池、松滋决口之前，汉寿、常德县境内的水患主要由沅水流域内降水与洞庭湖水泛涨及相互顶托造成的。例如宣德元年（1426），“龙阳、武陵二县久雨，江湖漫涨，冲决堤岸，漂流民舍、淹没田苗”。明正統十一年，“湖广龙阳二月以来大雨，洞庭湖堤决，居民男妇多被溺死，飘没庐舍、禾稼无算”。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夏淫雨六十日”，汉寿县“官私垸尽溃”。^{[24] 71, 74}而沅水含沙量较低，自古有“沅江清悠悠”之称，据水文资料统计，洞庭湖多年平均入湖年沙量为1.67亿吨，其中1.32亿吨来自长江的入流，0.3亿吨来自湘、资、沅、澧四水。^{[26] 538}相对于荆江分流，这样的含沙量微乎其微。因此，在藕池、松滋溃口之前，汉寿、常德的泥沙淤积与堤垸修筑多位于县境东北、东部受澧水、虎渡分流影响的区域。

而自藕池、松滋溃后：

光绪中叶，安乡已渐淤高，华容亦半成垸，武龙沅湘各县距藕池较远，得淤较迟，建厅（南洲厅）之时，尚属水国，及光绪末造，一因江水入口由九都之右经安乡境会澧水经白蚌口，下入黄公湖，合油港分来之水，并流入天心湖，至障百垸尾，一因沅水由辰常而下，经汉寿城北流经鸭子港，析入青莲湾护国障，出南嘴大河，二水歧下同汇于赤山大马嘴，对照障百垸，始兴九都，干河自北而来，相汇于是，沅渣江三水会合，折向东南，奔腾而下，浑如泥浆环抱。^[27]

荆江分流携泥沙倾泻于洞庭西湖，带来两方面的影响。一则北部湖区停水落淤，湖洲出露；二则逼水南侵西展，同时抬高水位。随着洞庭湖北部区域的成陆与围垦，湖泊容水区域日渐缩小，汛期水位不断升高，民国汉寿县邑人徐蔚华撰《洞庭湖七十年变迁记》云：

则咸丰迄今，以予目睹之水高于地约两丈。康熙迄今，以先辈之言证之，水高于地共有二丈七八尺。此予本境先朝未淤之

地与今年盛涨之水面两相比较约高三丈，则沿湖各州县可类推矣。^[27]

在汉寿县境内，20世纪30年代汛期江水并四水盛涨之时，湖水可高出“未淤之田”约三丈，其中两丈的落差为藕池决口后七十年淤高所形成的。水位的抬高顶托沅水、澧水下游河道，造成流域内严重的水患与溃垸。民国水利专家李仪祉曾对入湖水系做如下评价：

湘、资、沅、澧四水同归于湖，而水道交错紊乱，互相阻碍，故澧可以乱沅，沅可以乱资，而资又可以乱湘；又加以扬子江洪水由四口倒灌而入，纵冲横碰，四水之流更乱。向，泥沙之沉淀多在是等处。水既彷徨若失路，则其归于湖也不顺；归于湖也不顺，则其入江也不利。^[28]

尤其松滋河与沅、澧多处相通，各个水系的洪水互相顶托，经常形成全区性洪灾。加之荆江分流携带大量泥沙南下，迅速淤塞西洞庭湖，容水区域减少，湖体底垫日高，沅、澧之水壅积河口，下泄不畅，从此灾害频发。从咸丰十年（1860）至宣统三年（1911）的短短52年间，位于沅、澧尾闾的常德府共计发生洪水灾害40次^{[20]74-75}，康雍乾三朝修建之滨湖堤垸尽溃。1900至1911年，连续12年水灾，其中光绪三十二年（1906），整个洞庭湖区，因水灾死亡三四万人，各地“浮尸蔽江”。尤其1909年6月中旬，沅、澧同时上涨，加之松滋、虎渡河洪水后继，至八月仍未消退，修筑于明正統十一年之大围堤溃废为湖。^{[24]75}1910年，沅江大水，“常德近城数十里，除一连八障外，尽成泽国”。1910至1949年间，仅汉寿、常德两县发生水灾16次，均为全流域性灾害，灾情深重，溃垸无算。尤其1931年，沅、澧大水，湖区各县溃垸683个，近十万人逃徙他乡，其中尤以汉寿县最为惨重。汉寿县两日内溃决80余垸，县城全淹，当年，全县仅大凡洲、太和、铜盆障3垸未溃。《湘灾特刊·汉寿县水灾区域图说明》记载：“游巡塘、欧阳港、毛家滩、毓德市、高汉障、小泗障一带堤上，素称人烟稠密，全皆被水冲洗无屋无堤，唯一二古木低昂水际而已。”同年，常德县溃决120垸，城内“渍水深达丈余”。随后1932年、1933年接连大水，赤山以西之大连障溃废为今日平湖主体，1935年续发全流域性特大洪水，汉寿溃垸305，常德溃垸116，被灾人口八十余万，灾情震惊全国^{[24]76-82}

三、环境变迁引发的汉寿、常德的血吸虫病流行

汉寿、常德二县的血吸虫病流行与其县境环境变化相伴随。根据血防机构调查的口述史资料，汉寿县中部流行史如下：

金龙大队位于沧港公社万福垸外湖州上，这里流行血吸虫病已经有许多年了，据当地老人回忆，60年前这里就发现了“黄肿大肚”。以后由于“黄肿大肚”的流行，死亡接踵，减人灭户，逐年增加。1937年全大队有341户，432人，到1949年解放时，只有79户，223人了。十三年中，人户就减少得近一半，据访问调查：除15户23人，因害怕“黄肿大肚”而迁出外，其余死亡的186人，就有142人死于“黄肿大肚”，死亡率占32.4%，平均每年死亡11人，最可惨的是1940年，因患此病死的就有40多人，三只四人捕鱼船，死的每个船上只有一个艄公了。由于生的多死的少，十三年内，灭门绝户者就有47户，并有27户寡妈。^[29]

原住菱角湖张家婚废堤上的捕捞大队，1929年前是个大村庄，全村有181户，716人，由于血吸虫病的摧残，到解放时仅20年间，死绝代的有99户，395人，村内麻得街一截长达一里多路的堤上，50户人家全部被血吸虫病害死，成了“鬼唱歌”的绝代堤。到解放时只剩下33户96人，而这33户中就有31个寡妇，12个孤儿，成了有名的“寡妇村”。汉寿县菱角湖，是围堤湖内的一个废垸，过去是一片野湖荒洲。^{[30][31]}

我们社（沧港乡报国社）里从1935年—1955年20年内死亡567人，平均每年都要死去28个多人，其中死于大肚子病的342人，有21户成了绝代户，43户寡妈（有35个中年改嫁），这些因血吸虫病死亡的，90%以上的都是气力莽壮的后生，仅姓余的五户人家，在“民国”26年、27年两年内，就因下河捕鱼感染血吸虫病，先后死去17个青壮年。^[32]

靠近县城的杨旗咀一段废堤，原有二百四十户，七百二十五人，解放前二十年间，由于血吸虫病的危害，到解放时，仅剩下二十一户，六十七人，幸存的也大部分是黄肿大肚病人。^[33]

图 2 汉寿县血吸虫病流行史



上述金龙大队、张家婚、报国社、杨旗咀四个地区（地点所在详见图 2），均位于沅水主泓所经的万福垸区域，清末溃决之大围堤之西南角。这一区域的血吸虫病流行大致开始于大围堤溃废后，与沅水改道、堤垸溃废所引发的环境变迁有关。大围堤为正统年间修建的老垸，位于沅水主泓以北，与汉寿县城隔江相望，在建成初期，税赋几分汉寿之半。在历史上，虽然屡经溃口，然而历任地方官吏均不断堵口复堤，重修加修，到清末尚可艰难支持。后伴随着荆江分流不断加强并南下倾注西洞庭，西洞庭湖北部成垸，逼水西、南侵，加之泥沙淤积、河流顶托，沅水下泄不畅，水患频发。1909 年，大围堤溃口，到 1911 年，沅江续发大水，大围堤溃废为围堤湖：

尤以安彭家为最，这里正当沅水主流，巨大的洪流把几里长的大堤冲成河槽，直下小港、王家古和接港口，由西向东在大围堤中间冲开一条新的河道，逐渐成为沅水主流，这就是现在从安彭家至王家古和接港口的沅水主洪道。尔后（1918 年），大围堤分为两半。一半在河槽南面，一半在河槽北面，各自形成大片湖洲。湖洲再度形成后，人又由守转攻。1930 年在高阜之处筑四美垸，1943 年修同春垸，1946 年筑万福垸（平安垸），1947 年筑寿丰垸。至 1949 年，湖内高洲遍布，平均高程海拔 33.5~34 米左右，形成 10 万多亩的大湖洲。^{[34]199}

现在自常德而下至西港、赤山一百八九十里，沅水因江水抵触，不能畅泄，浅渚回于此，逼而高涨，则下江泥水自难上泛，遂清澈而无泥，不独地势不能增高，而且日形其低洼，故常德汉寿沅江城郭池隍皆沉于水，再迟一二十年，淤潮必缓，沉塌必加。一俟太白湖大围堤五村障废而复兴，则水头当再加四五尺，始有停止之期也。^[27]

大围堤被洪水冲溃后，由于洞庭湖水的顶托，沅水下泄不畅，在此逼而高涨，加之水流清澈，地势无法淤高，因此成为环湖最低洼之所。到 1947 年，长江水利工程总局查勘洞庭湖时：

洞庭西湖区多系零星湖泊与废垸组合而成，之湖岸已向南伸展，且平湖稍有淤积，围堤湖大部系废垸所成，除西南部略有淤积外，东部甚少淤积，且围堤以东各垸如大连障等有废弃趋势。盖以洞庭湖由江水挟入之泥沙，逐渐由因以抬高所致。^[35]

由于围堤湖西南部正处于沅水主泓的回旋落淤之所，伴随着 1946 年万福垸在此修筑，沅水主泓改经万福垸以北入湖，原本沅江县城以北与大围堤之间之沅水故道渐渐淤塞，绕万福垸及东部的围堤湖形成一口袋型的淤积河道。而在汉寿县地域范围内，由于清末以来历年水灾与溃垸，如围堤湖一般的案例遍布县境。在一系列水灾与泥沙淤积的作用下，由于河湖淤高，渍水常年

无法排出。1936年,《东方杂志》载,“本县上年水害之后,渍水很大,无法排出,形成渍灾”;1938年,“渍水大,连日落雨不止,损失不大,未倒,山区收成较好,约六七成,湖区因渍水较差”;1948年,《中央日报》刊登“汉寿之大泛小泛洲及东北各垸,渍水深者丈余,浅者四至五尺,垸外水位高出垸田五尺以上,渍水无法排出”¹。垸内因此积水成湖,并随垸外水位涨落而变化。此外,加之时逢战乱,人民流离失所,年年渍垸,根本无暇修复,到20世纪50年代,汉寿、常德破败已极,既往县境,大半沦为鱼鳖之所。

根据血吸虫流行病学,在洞庭湖洲,植被分布自低向高,白泥洲以上可分为草丛泥洲、草洲、芦杂洲、芦苇洲。每年水淹时间:芦苇洲50-150天,芦杂洲100-190天,草洲为150-200天,草丛泥洲为180-220天,白泥洲水淹时间在220天以上。草洲钉螺密度最高,其次是芦杂洲、芦苇洲、草丛泥洲。白泥洲滩一般无钉螺孳生。钉螺分布与洲土高程的关系是间接的,与水淹日数的关系是直接的,与植被环境也有密切的关系。^{[36] 21}

以大连州为例,原名大连障,建垸于乾隆六年(1741),废垸于1934年,后逐年淤积。至1954年测量地面高程为:最高28.81米,最低25.93米。到1970年已淤高有2100亩白泥洲达31米。1971年移栽芦苇淤扩猛增,1973年它的面积已扩展为11242亩了。1970年至1973年四年均未发现活螺,但在1974年10月查螺,初次发现钉螺分布,有螺框出现率为2%,活螺平均密度0.02只每平方市尺。本次查螺,有螺框出现率76%,活螺平均密度2.45只每平方市尺。^[37]

清末民国的水灾与渍垸,使得汉寿县县境大部沦为废垸,其中相当一部分区域有着悠久的开垦历史,土质肥沃,杂草丛生,高程较普通新淤洲滩为高,水淹日数通常在50-200天范围内,长满芦苇什草,形成有利于钉螺分布的广阔栖息地。加之渍垸后,人们复堤排水新垦,然而由于外江水位的抬高,新垸渍水无法排出,垸内渍湖附近钉螺密布,哪怕开垦经年,钉螺也可以生存,因而疫情深重,这应与沅江县北地势高阜之新挽堤垸相区别。在这样的水环境变迁的背景下,汉寿县的血吸虫病爆发流行开来。

大围堤西南角之万福垸人口调查统计资料^[2]如表1所示:

表1 万福垸人口统计表

户数	男	女	共	每年平均 人口数	性别比	三年来 活产数	出生率 (%)	十年来 死亡数	死于血吸虫 病数	百分率 (%)
707	1548	1308	2856	410	1.091	191	22.3	622	155	24.9

可见其血吸虫病流行造成了十年来垸内四分之一的人口死亡。根据民众的口述回忆资料,汉寿县的血吸虫病流行大致开始于大围堤溃后,疫情率先爆发于沅水故道的中部,逐渐向两端扩展。金龙村,刚好位于沅水支流沧港入江口一侧,泥沙淤积,且靠近沧港镇,居民点密集,舟船往来辐辏,因而血吸虫病最早爆发于此,随后沿河岸的上下游,向两端扩展。除了爆发时间的差异外,感染率方面也有很大的不同。该垸三个社成一字形分布,其感染率上游低于中游,中游又低于下游^[2],如表2:

表2 万福垸四社血吸虫病感染率

类别	上游	中游	下游	最下游
社(队)	报国(一队)	双福(三队)	金龙(一队)	张家碛
户数	20	36	29	37
人数	90	118	89	121
皮内反应阳性数	42	57	51	92
百分率(%)	46.67	48.2	58.4	76.03

¹ 汉寿县水利电力局:《汉寿县水利志》(内部发行),1981年,第51页。

从表 2 可以看出下游感染率最高，一则是下游居民临疫区而居，感染机会多，而水流迂回，适宜钉螺滋生繁殖，上中游居民离疫水较远，而西南又当沅水洪道，水流湍激，不适宜钉螺生存，故感染率较低。^[2]

从表 2 可以看出下游感染率最高，一则是下游居民临疫区而居，感染机会多，而水流迂回，适宜钉螺滋生繁殖，上中游居民离疫水较远，而西南又当沅水洪道，水流湍激，不适宜钉螺生存，故感染率较低。^[2]

而在县境东南：

毓德铺公社的田家洲，五十多年前有五十五户，近二百口人，洲上有百货铺，“穿衣吃饭不离村”。以后十多年间，一户户“黄肿大肚”死绝，到解放初期，只有后来迁去的张连生等 4 户 10 口人；这 10 口人又有 9 人患血吸虫病，其中 3 人已进入晚期。^[38]

该区（第十区）的北部有一个大南湖，在百年前此湖是一片熟地，居民可住可耕，于光绪十几年内洪水浩大，此地即被淹没。如今未曾修复，越几十年后，南湖地带淤积成一些零星的沙洲，现各呼田家洲、瞿家洲、张家洲，大口年湖，张家寨这些洲地土质肥沃，湖草丛生，所占的面积约 16780 市亩。^[39]

龙潭桥公社的百家咀，清朝光绪年间还是一个“鸡犬相闻”的大村落，有上百户人家，“黄肿大肚病”流行后，死的死，逃的逃，墙坍屋塌，变成了一个坟冢累累的荒丘。^[38]

田家洲、百家咀均沿洋淘湖向西南沿撒洪河流域分布，在清中叶前，这两处均为熟地，到光绪年间，由于北水南下，湖水南侵，原本沿今日平湖南端绕赤山以东入湖的沅水主流淹没入湖，土变成水，田地被淹没，先是原洋淘湖、安乐湖等内湖，沦为目平湖的一部分，随后湖水继续南侵，在护城大垵以南形成一片名曰南湖的浩淼水面。湖水淤积、沙洲涌现，田家洲、百家咀的血吸虫病爆发流行正是反映了这一历史进程。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泥沙的淤积，20 世纪 50 年代，又重新围垦为大南湖乡与洋淘湖农场，短短百年时间内，自然环境一变再变，在今天的卫星图片上，已然完全不见此二湖的踪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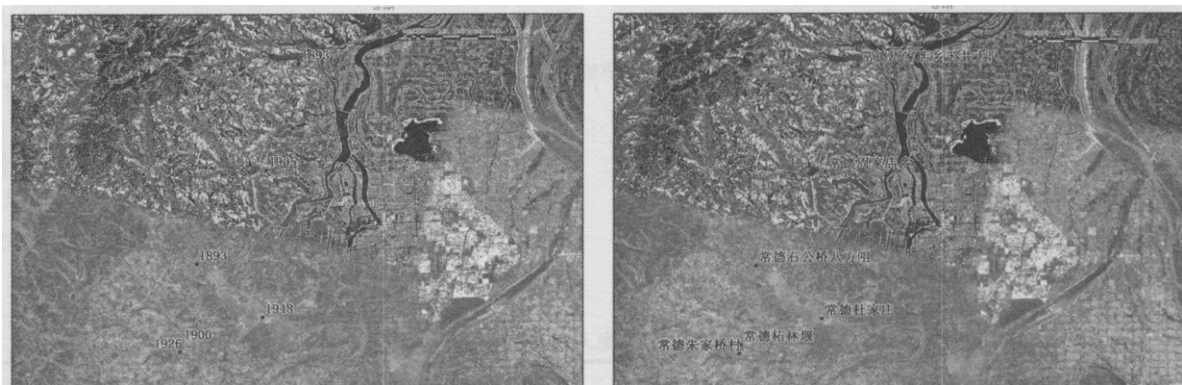


图 3 常德县血吸虫病流行史

在常德县东北：

如石公桥的八方咀，在六七十年前是一个聚居有 85 户人家，二百多口人的自然村，因为这里“大肚子病”流行，绝大部分居民染上了这种病症。据调查，全村两百多人口，因患大肚子病而死的有 113 人，患这种病死绝了户的有 28 家之多，到 1949 年就只剩下破破烂烂的一十五屋人家，冷冷清清的三十五口人了。^[40]

阳家屋场，解放前五十多年这里有五十多户姓阳的居民，结果也因为“大肚子病”成灾，弄的全村荒芜，全村人口死的死，亡的亡，没有被血吸虫夺取生命的也不敢再住在这里，而迁往外乡，到解放时就只剩下一片荒坪了。^[41]

台子杨家 30 年前有 110 多户，近 500 人口，至今只剩 4 户，16 人，1 个劳力，询其历史，多系死于“大肚子病”。^[41]

在周家店公社靠近渡口的天井大队一带，原来称为北赵家培，七十多年前是一个十分热闹的圩场，据老人们回忆，当时澧水有一条分支从这里流过，那时北赵家培水陆交通方便，人丁兴旺，市场繁荣，五业齐全……结果就因为“管箕馊”流行，仅几十年时间，这里的居民死的死，迁的迁，北赵家培就变成了一个只剩下彭后垓一户住户的荒山野岭了。直到解放后因整修了西洞庭，河流改道，水系发生了根本变化，这才有人重新搬迁进去，逐步发展成现在的天井和闵家桥大队。^[40]

常德县的血吸虫病疫区主要分布于县境东北沅水、澧水分支所经流的区域，为河汉型疫区。沅水自牛鼻滩分流东北、沟通澧水之小河口、渐水流域，上文中有提到，这条河道在历史上几经兴废，频繁变动，并曾导致汉寿县治的迁徙，根据 20 世纪 50 年代的血防资料，整个流域都是疫区。周家店乡，是洞庭湖区最早报告有血吸虫病的地区之一。1905 年，常德周家店一位 18 岁姓郑的渔民，常在洞庭湖捕鱼，因患痢疾到常德广德医院就诊，粪检发现血吸虫卵，由该院美国医生罗根(Oliver Tracy Logan)在《中国医学教会杂志》上作了题为《湖南省一名由日本血吸虫引起的痢疾病例》的专题报告。^①这是在我国发现的第一例血吸虫病人。1924 年，在常德周家店附近两个村子，对 10 至 50 岁的居民进行检查，粪检涂片法受检 63 人，其中 38 人有血吸虫卵，阳性率 60.3%。同年，美国人浮士德(Fause)与麦隆利(Meleney)报道，常德周家店受检男子 95%，87.5%患有血吸虫病。^[42]

据史料记载，其北部渡口镇附近的天井大队血吸虫病爆发流行于 19 世纪末期，这与 1860 年松滋口溃，南夺虎渡河道并进而于七里湖之下侵占澧水河道有关。在此之前，澧水分支从北赵家培圩场下经过。澧水在洞庭湖水系之中，含沙量较湘、资、沅三水为高，然而与荆江分流相比，仍是大大不如。沅澧之间的渐水、小河口分流在荆江南下前的一千四百多年中，虽然屡淤屡开，但仍可勉强维持河道走向，可为一证。而到了光绪年间，澧水被之前的虎渡、后来的松滋侵占河道，而被迫至安乡县境西南角，向南潴水为七里湖，荆、澧在此混合，无分彼此，又南至汇口入常德界，荆江分流从而影响到沅澧通流这一支。朱家桥、八方咀、柘林堰、赵家挡均位于山区向平原过渡区域，在历史上都是滨河湖之湖汊。荆江分流携带泥沙迅速淤填，在赵家挡西部的河道中迅速淤出洲滩，曲流因此发育，在今天的卫星图片中期 S 形河道清晰可见，环境因此变得适宜血吸虫中间宿主钉螺的繁衍。加之此地水陆交通便利之集镇，舟船人员往来，血吸虫因而在此爆发流行开来。其下游冲天湖左近的区域也差不多经历了类似的环境变迁进程。

四、结论

汉寿县与常德县位于西洞庭湖边缘，其水环境变迁深受沅水、澧水及洞庭湖水三者相互作用之影响。其中汉寿县主要受沅水的影响。在宋代以前，沅水主泓由汉寿县北转向东北入洞庭湖，今天的主泓道为其入资支流所经。至明中叶，伴随着澧水西移，虎渡增强，入湖三角洲发展，鼎江口渐渐淤塞，至清初，向西经沅江县西入资一支演变为沅水主泓。随后，伴随着清中叶以降四口淤灌洞庭，西洞庭湖北部迅速成垸，湖水被逼而向西向南扩展，加之日平湖水位日高，沅水消泄不畅，至民国，汉寿境内水患频发，严重程度举世罕见，大半县境沦为泽国废垸，成为洞庭湖区钉螺分布最广阔的疫源地之一。

与汉寿县不同，常德县北部的血吸虫病流行更多是受到沅澧通流的影响。这条河道古已有之，历史上几通几塞，作为一条不大的分流，之所以仍可维持其河道形态，得益于沅、澧都是含沙量较低的河流。而自万历年间疏浚虎渡，荆江分流入澧之势日强，澧水渐渐被迫至安乡县东南一隅，至 1860 年，松滋溃口后，夺虎渡分支南下，与澧水交汇潴为七里湖，而后南下，在含沙量巨大的荆江分流作用下，沅澧分流迅速回旋淤塞，洲滩出露，自然环境演变为适宜钉螺栖息繁衍，直接导致了血吸虫病在

①参见 Logan, OT (1905). A case of dysentery in Hunan province, caused by the trem atoda, Schistosoma japonicum. Chin Med Missi, J 19: 243-245.

该区的爆发流行。

参考文献

- [1]钱信忠. 中华人民共和国血吸虫病地图集[z]. 上海: 中华地图学社, 1985.
- [2]汉寿县血吸虫病防治办公室. 汉寿县血吸虫病调查工作总结[B]. 汉寿县档案馆, 1956, 33-1-1.
- [3]张修桂. 荆江百里洲河段河床历史演变[M]//历史地理(第八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 [4]周凤琴. 从河道历史变迁研究探讨长江上游卵石的来量——以长江中游百里洲河段为例[M]//历史地理(第十六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 [5]张修桂. 中国历史地貌与古地图研究[M]. 北京: 社会文献出版社, 2006.
- [6]张修桂. 洞庭湖演变的历史过程[D]. 历史地理, 1981(创刊号).
- [7]周国琪. 洞庭湖盆的由来和演变[J]. 湖南地质, 1984, (1).
- [8]何业桓, 卞鸿翔. 洞庭湖自然环境的历史变迁[J]. 自然杂志, 1984, (6).
- [9]杨达源. 洞庭湖演变及其整治[J]. 地理研究, 1986, (3).
- [10]卞鸿翔, 龚循礼. 洞庭湖的变迁[M]. 长沙: 湖南科技出版社, 1993.
- [11]周宏伟. 洞庭湖变迁的历史过程再探讨[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05, (2).
- [12]班固. 汉书[M]. 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 [13]酈道元. 水经注[M]. 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
- [14]范致明. 岳阳风土记[M]. 明刻百川学海本.
- [15]钟崇文. 岳州府志[M]. 明隆庆刻本.
- [16]顾祖禹. 读史方輿纪要[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 [17]傅泽洪. 行水金鉴[M]. 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8]黄教溶. 龙阳县志[M]. 清光绪刻本.
- [19]应先烈. 常德府志[M]. 清嘉庆刻本.

-
- [20]何玉棻.直隶澧州志[M].清同治刻本.
- [21]欧阳忞.舆地广记[M].士礼居丛书景宋本.
- [22]刘启端.大清会典图[M].清光绪石印本.
- [23]长江水利工程总局.洞庭湖查勘报告[J].水利通讯,1948.
- [24]常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常德地区水利志[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 [25]汉寿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汉寿县志[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26]中国水利年鉴编纂委员会.中国水利年鉴2002[M].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2.
- [27]徐蔚华.洞庭湖七十年变迁记[M].民国25年刻印本.
- [28]李仪祉.对于整理洞庭湖之意见[J].扬子江水利委员会季刊,1936,(3).
- [29]汉寿县血防站调研组.金龙大队血吸虫病防治工作调查报告[B].汉寿县档案馆,1962,33-115.
- [30]中共汉寿县沧港公社委员会.改造菱角湖、彻底送瘟神[B].常德市档案馆,1972,107-1-42.
- [31]中共常德地委血防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德地区血防志(1956—1979)[B].1981,107-1-106.
- [32]治疗血吸虫病给我们带来的幸福——汉寿县沧港乡报国社社委兼十、十一、十二生产队[B].汉寿县档案馆,1956,33-1-3.
- [33]中共汉寿县委员会.矮围灭螺“送瘟神”[B].汉寿县档案馆,1976,33-1-38.
- [34]徐民权,等.洞庭湖近代变迁史话[M].长沙:岳麓书社,2006.
- [35]长江水利工程总局.洞庭湖会勘报告[J].长江水利季刊,1948,(4).
- [36]沅江市卫生局.沅江县血防志[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
- [37]中共汉寿县委血防领导小组办公室.汉寿县钉螺分布情况的调查报告[B].常德市档案馆,1980,107-1-90.[38]汉寿县血防领导小组办公室.驱逐瘟神、改造南湖[B].汉寿县档案馆,1965,33-1-15.
- [39]汉寿县血吸虫病防治办公室.第十一二区血吸虫病疫情调查总结[B].汉寿县档案馆,1956,33-1-1.
- [40]中共常德市委血防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常德市血吸虫病流行和防治工作情况资料汇编[B].湖南省档案馆,1961,254-2-141.

[41]常德县血吸虫病防治委员会办公室. 常德县血吸虫病流行病学调查总结[B]. 常德市档案馆, 1956, 107-1-4.

[42]中共常德地委血防办编. 常德地区血防志—湖南省常德地区血吸虫病流行和防治工作资料汇编(1956-1979)草案[B]. 常德市档案馆, 1981, 107-1-94.